

徐红军 著

Life and development

# 生命与amp;发展



辽宁教育出版社

# 生命与amp;发展

徐红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与发展/徐红军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382-8451-5

I. 生… II. 徐… III. 生命哲学—研究 IV. 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2038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10 千字 印张: 8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严中联 刘 隽 责任校对: 张小沫 沈 剑  
封面设计: 刘玉琛 版式设计: 李 爽

---

ISBN 978-7-5382-8451-5

---

定 价: 20.00 元

# 前言

---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想要划清界限的是很多书的那种就自由论自由的情况，因为那样总摆脱不了循环论证的阴影。自由和人的自我不能分离，自由始于并建基于人的心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认识。而且自由并不具有绝对的价值。在本书中我引用最多的是《论语》，希望从各种角度找到《论语》中的智慧与现代生活和自由话语的结合点。

下面，我把这本书的思路作一个简短的梳理：

首先，本书是从个人的感觉开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冲动和美好的追求，但也要有自己的坚持，这就是本书引言“内在自由存在吗？”的出发点。从微观到宏观，个人的性情如何塑造了国民性，又如何形成了文化？不同的文化与国民性，其差异为什么如此之大，为什么充满了善良意志的近代中国总是落后挨打？这些是第一章“文化与国民性”中隐含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还得回到个人。于是第二章“自我的建构与解构”就从心理学的微观角度来考察个人的形成过程，因为抛开后天的影响只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大家都同样是人，同样都有各种的情感与需求。在这一章里我追溯了一些经典作者对“自我”的

考察，突出了“爱”和“安全感”对自我建构的重要性，考察了自我的他性，提出了依赖性自我的理论价值，最后以对“理性、欲望和情感”的辨析作为本章的结束。

因为有第二章的基础，我就觉得可以更好地开始所谓西方的价值“自由”的讨论，这就形成了第三章“从自我到自由”。首先，个人主义和自由是密切相连的，我步许多经典作者的后尘，再次努力澄清“个人主义”的含义，这对某些人来说是老调，对某些人来说是新词，但却是说到“自由”不得不提的话题。说到伯林也是同样如此。

“可能性与自我发展”一节哲学术语太多，单是题目就几乎等同于“自由”了，而当我写下这句话——“自由就是对未知领域的不断开进”时，我不知道这离“自由”的本意有多远。在“自由与信仰”一节中，我粗略考察了西方宗教对自由理念的渐进的接纳过程，以及西方宗教、中国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关系。至于“法治社会”和“思想与言论自由”两节涉及了自由的应用层面，我想说这两者是社会发展的的大势所趋，在此前提下它们并不唯一。

总的来说，从个人内心的控制感和依赖感中发展出的自由和集体的两种取向，不能被放大为极端孤立并对抗的价值，就像不能在一个人的内心抹杀控制感和依赖感中的任何一个一样，在社会层面也不能扼杀一方只留另一方，否则只能以失败告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的不断融合可以作为事实的证据。

在经过了以上的铺垫之后，我终于可以在第四章开始我最为关心的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了。无可置疑，是孔子塑造了中国的传统，他悲天悯人的情怀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即使不用刻意强调，纵然“全盘西化”，我们在根子里也还是有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传统中重要的代表因素有文化、经济和政治，如果只把眼光关注于经济和政治

治上面，就不能全面地说明中国传统的问题，而有太多的人把学术关注点集中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体制，以为经济现代化和代议制民主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稍微有了经济的发展就高喊政治体制的改革，却不去总结甲午惨败的根源，也看不到那些实行了代议制民主的落后国家的挣扎。因此，还是应该聚焦于传统中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教和家庭价值观。中国和西方在宗教和家庭价值观上的差异带给人的心理差异，才是中西差异的根本，而这是无法迅速、彻底改变的，只能踏踏实实地努力。也许就像先哲所言，对传统重要的是辨识，辨识出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需要扬弃的，这不仅仅是个人智识的问题，而是需要社会磨合的过程和时间凝固成历史，要相信“所有的苦难都会有回声”。

第五章“尼采和后现代主义”是以现代之后为视角对上述几章内容的深入。当然对中国人来说，“后现代主义”有些遥远，我们仍然需要理性的启蒙，感情用事只能代表着狭隘。但另一方面，不能单单以理性作为启蒙的基点，那不过是重走西方社会的弯路。然而也不能没有理性的启蒙，我们需要理性，建基于工具理性之上的科技立国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之一。同时我们要看到那些所谓理性社会的无奈，所谓的现代性的危机，那也是人类共同的课题。

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完整和不断的发展，这就是我在结语中所要表达的，也是本书的主题。

引言 内在自由存在吗？ / 001

---

**第一章 文化与国民性 / 005**

---

**第二章 自我的建构与解构 / 011**

第一节 从真实自我到自我取向 / 011

第二节 自我的建构 / 015

第三节 他者和内化 / 032

第四节 自我的解构 / 052

第五节 理性、情感和欲望 / 062

---

**第三章 从自我到自由 / 083**

第一节 审视个人主义 / 083

第二节 伯林论自由 / 096

第三节 可能性和自我发展 / 103

第四节 自由与信仰 / 111

第五节 思想和言论自由 / 120

第六节 法治社会 / 127

---

第四章 中国传统中的自我和自由 / 136

第一节 孔子的个人理论和社会理论 / 136

第二节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严复思想 / 150

第三节 家庭，美德抑或桎梏 / 160

第四节 中国人的自我和自由 / 168

---

第五章 尼采和后现代主义 / 186

第一节 主体性——人的失去和回归 / 186

第二节 精英主义 / 195

第三节 欲望辩证法 / 203

第四节 现代性的危机 / 214

---

结语 生命与发展 / 230

部分参考文献 / 237

后 记 / 242

## 内在自由存在吗？

一个智者说过，自由总是相对于什么的自由。正是针对中世纪的宗教压迫，西方启蒙运动才提出了以个人自主为核心的自由。而伯林“否定的自由”针对的是法西斯等极权主义。如今之所以要凸显和弘扬内在自由，是因为它对当今的中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经过百年风雨洗礼后，如今的中国进入了一个价值和文化趋向多元的时期，许多人茫然而痛苦。辨明某些价值和概念此时尤为紧迫，内在自由就是其中之一。

林毓生说：“在获得了外在的自由制度和秩序的保障以后，如果一个人内在的意识被怨恨、恐惧和无知所占据，那他仍然是没有自由的。一个人只有在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清楚的自觉，对生命的资源有清楚的自知的时候，才能享有自由。根据这些资源，在人生中才能以自由意志获致道德的尊严——这是从内在的观点来界定自由。”（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96.289）有了内在自由的人就会成为果敢的人。之所以果敢，或是因为经过深思熟虑，认同了某种伦理价值；或是经过深思熟虑，摆脱了道德警察的纠缠；或是因为自然天性使然，使他成为一个富于行动性的人，成为一个勇者。

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不移”就是具有一种内在自由。除了上智与下愚外，其他人只有通过学，才能战胜恐惧，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内在自由境界。中国古老的传统留给我们的是对内在自由的不懈追求，尽管这个追求在封建社会是以狭隘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认同和价值的统一为终点。

孔子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些都是对内在自由的古老描述。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被佛家引为同道，可佛老之道充其量只是半个自由，他们没有积极进取的行动，消极遁世地走进一个不可知的死胡同，就像伯林所说，“退居内在城堡”。（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林出版社，2005.204），如果说那是自由，不如说是无奈，是残缺的自由。内在自由既是指内心的丰富，也是能表现出不犹豫的行动，因为有了内心的丰富才能无所畏惧，才能“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在现代人看来，内在自由可能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天性的倾向和免于习俗的侵蚀而产生的，它与深谋远虑不沾边，因为“通过提高自知之明来追求自主性可能耗尽一个人的力量和能力”。（约翰·格雷·伯林·昆仑出版社，1999.32）这种倾向也会在庄子的言说中找到共鸣。如果对由中国庄老而发展起来的道家不以出世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更正面意义的作用。对这种人的自然的天性的保护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的文明标志。但现实中人的内在自由总是面临内在的分裂和外在的分裂的威胁——内在的分裂来自于人自身的各种冲动、欲望和潜意识，外在的分裂来自于社会的多元目标、多重价值和人际关系。这使得人不得不面临自我选择和自我定位的焦虑。现代社会中的人就好比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面对守卫的火与剑，不得不无家可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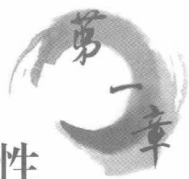


内在自由告诉人的就是不要自我限制，要敢于试错，有决心和意志按自己的方式行动，“摆脱了习惯、被舆论强化了的概念和思想方式的束缚”，但同时又区别于一意孤行，能够自我“扬弃”。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可能是永远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但每个人都会给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唯一答案，他的依据是他的生活经历、他生活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这些给了他不同于他人的价值认同，使他有了不同于他人的特点。

内在自由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所说的基本自由。基本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这是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普遍认同。不是说人得先有一个内在的自由才能去选择，但有了内在自由的人更敢于选择，更敢于打破命运编织的天罗地网。

内在自由与文化与传统关系密切，这正是我在接下来一章要讨论的课题。





## 文化和国民性

“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文化、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特征的总和。”（袁洪亮. 人的现代化. 人民出版社，2005. 16）这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给出的定义。

还可以从各个国家横向比较来看。密尔说：“每个个人周围的环境与其他个人周围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民族或每一代人周围的环境与其他民族或其他一代人周围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些区别在不同的性格的形成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影响，人类没有一个普遍同一的性格。”（密尔. 论自由. 商务印书馆，2008. 67）

泛泛地说，无论是经济上自立，还是情感上自我依靠，欧美人的独立性都较强，而亚洲人对家庭的依赖较强，其思想意识中团体取向较浓。这样的区别使得中国人不注重个人自我，没有个人特质培养的愿望，自主性动机较弱。相反，在中国社会里，集体主义有较大的社会认同，社会道德观念强。

在清末民初中国多灾多难的时期，许多了解欧美的中国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反思并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的。如严复说：“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安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娱。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 论世变之亟.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3）那时的中国人在异族的精神压迫下生活几百年后，已变得愚昧、自私、盲目自大、麻木、保守、顽固不化；图虚名、要面子、表面上虚张声势、骨子里胆小怕事；说谎造假、不讲诚信；知足常乐、享乐为先，容易接受现实、逆来顺受、不思进取。

严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开民智”“鼓民力”和建设“新民德”。与严复感同身受的梁启超同一时期写了大量文章，声讨国人落后的国民性，希望从“少年中国”开始重建国民性。孙中山也指出国人的奴性、无知和缺乏自由等特点。陈独秀在1915年12月《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认为中西差异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西方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第二，西方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第三，西方民族以法治、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道义为本位。（参见袁伟时.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82）他提出拥护科学，反对国粹，渐进地改造国民性。他将对国人行为方式的改造称为“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胡适后来所说的“努力”与之一脉相承。

在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高潮中，最振聋发聩的当然是鲁迅的声音：“以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 两地书）鲁迅把百姓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中的处境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 灯下漫笔）其实大家并不是不想做主人，在《阿Q正传》里，阿Q在土谷祠里做过三个白日梦：一是要杀人，二是要财富，三是要女人。阿Q的所有理想，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以这样的国民为基础，国家强大遥不可及。阿Q们如果成功，后果仍然很严重。鲁迅说：“民国以前，中国农民是奴隶，民国以后，他们变成前奴隶的奴隶了。现在是阿Q管理着这个国家了。”（鲁迅. 与斯诺的谈话）除了主人和奴隶之外，国人是否想过做一个自由的人？是否有林肯那样的觉悟——“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意做奴隶”

主。”

鲁迅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取到做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人一直都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挣扎。面对时代的灰暗，鲁迅既大声呐喊也深刻反思：“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文化偏至论）就是说要求得生存发展，首先是要立人，而立人之道是尊重个性，张扬精神。“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故乡）“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灯下漫笔）

落后的国民性也是一切落后的社会的共同特点。在一篇文章中我读到这样一段：“如果我们必须列出非洲文化的一个特征，那么个人服从于群体这一点肯定是值得列出的。非洲思想拒绝承认个人是一个自主的、负责的生物。从垂直方向看，非洲人植根于家庭，植根于老祖宗；从水平方向看，则与自己所在的集体相连，与社会相连，与天地相连。非洲人是家庭的个人，社会的个人，一切与宇宙相连。”（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 113）阿 Q 精神也不是中国人的专利，而是人类的通病，精神胜利法甚至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说白了就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自我肯定的心理，但过分的自我肯定就成了自负。所以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教育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凭骂人而想把一个人改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好是称赞他做得对的事，比叫人单单注意他做的所有恶事要更容易成功些”。（布克尔·华盛顿，转引自钱满素·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花城出版社，2008. 199）

“国民性”有时被等同于“民族性”，是一个笼统的词语，是一个象征着整体或者说概括范围很大的词语。但现实是不管如何归纳出高度概括的国民特点，都会在同一群体中找出反例。国民性也受到时间性的限制。国民性是一种抽象的说法，被灌注了太多的理想因素，被错误地当成一个可以操作的有用概念。其实没有统一的国民性。如果有统一的先进的国民性，

这样的国民性也将是导致国家灾难的隐患。从这个角度说，所谓民族劣根性都是以偏概全，没有可能是统一的民族缺陷，只是某一时期占优势和影响较大的民风，这也是所谓的文化特点。

“文化对国民性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文化与人格研究。……它主要研究共同的文化所决定的人们之间基本相似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认为每一种文化各有其支配个人及团体的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主要）理念或独特目标（宗旨），也即文化的基本构成——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人们的一言一行，都潜在地受制于这种最高理念和独特目标（宗旨），大家都把它当做模式，依照它去判断是非，因而形成一种相当一致的基本态度——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即所谓的国民性。显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塑造不同的国民性。”（袁洪亮. 人的现代化. 人民出版社，2005. 137）

史华慈说：“文化是个很复杂的事物，是个巨大而不稳定的范畴。因此，我最后决定采取‘文化导向’这个词。说‘导向’是因为它大体提供一个引导方向，比较灵活，也给人的活动留下余地。”“它的内部有很多张力。”（转自刘梦溪. 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苍凉与自信——刘梦溪学术访谈录. 中华书局，2007. 92）刘梦溪教授总结道：“史华慈认为，文化是一种未经决定的、不稳定的、相当松散的整体。他一再说，文化是个复杂的事物，是个巨大而不稳定的范畴。他说历史是麻烦的事情，一大堆问题，纠缠不清。它和文化一样都是一种‘问题性’或‘问题结构’（problematics）。问题，由于涉及人类存在的经验，所以是普世的；但是答案，由于出自于人，所以总是有分歧。”（刘梦溪. 史华慈：最后发表的思想. 许纪霖，朱政惠编. 史华慈与中国. 吉林出版集团，2008. 5）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



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马文·哈里斯. 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 顾建光、高云霞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136）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从“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角度来阐释文化概念。“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特性，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他认为：一切文化要素，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的，而且是有效的。“文化是就那一种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价值而言，这个概念包容着以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组成要素分解为如下几点：（1）物质文化；（2）精神文化；（3）语言文化；（4）组织文化。

有人认为，文化就是“以文教化”。晋人束皙《补亡诗·由仪》中提出：“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样理解的文化多了些文弱的意义。文化是一个多歧义的概念，甚至多义到丧失了其理论上的有效性，被指责为“泛理论”“过度抽象的理论”，根本不能用于指导实践。比如京剧是一种中国文化，但是京剧能代表中国文化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体”指的是文化？

但是从中西比较而言，差异是明显的。如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道德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就是宗教与道德的分别。电影《阿甘正传》中有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他们（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以中国人的视角，可能会说美国人没有道德。本迪切亚尼的《文化模式》传达给我们的意义是，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其基本的核心是价值观，并表现在各个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组织群体之中。陈维刚说：“我们可以把文化定义为一种以语言为基础而构成的对外部世界加以解释的整体意义体系，换句话说，文化所提供的是世界观。”（陈维刚，转引自卢克曼. 无形的宗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译本导言）

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我们这代人的耳朵听出了茧子的话，听起